

陈岱孙忆金岳霖、周培源

《往事偶记》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的随笔集。平实的笔触间,回忆其少年求学、归国治学的经历,以及与金岳霖、周培源等诸位同道好友的往来。

金岳霖幸而躲过轰炸

我和金岳霖曾是同事兼好友,他是1926年来清华任教的,而我则于1927年到清华工作。

金岳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他的两眼视力不好,怕光,所以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戴上一个绿塑料的眼遮。加以一头蓬乱的头发,和经常穿着一身蓝布大褂,他确实像一个学校的教师。他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即划出每日的上午为他的治学的工作时间。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在这工作时间内,他严格地闭门谢客,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但他又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教书是他的第一职责。他当年住在城里,每星期来校上课三天的日子里,他得一早从城里赶车来清华园。一部分的上午时间已经花在旅途上,他又不肯请学校将他的课程全排在下午,以便腾出三天的一部分上午时间干他自己的治学工作。于是他实际上每星期只有四个上午可供自己治学使用,从而更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更严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不见客和干其他事务的规矩。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一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

抗战时期,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昆明。这个习惯有一次几乎为他带来

了不幸。当时昆明多数专科学校因避免空袭干扰,都已于是年春间陆续疏散下乡开学。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暂供理学院春季始业作教室和宿舍之用,并以之暂供安顿师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乡区的昆华师范学校,我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二三百米外的昆华农业学校。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各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金先生住在中楼,当时还正在进行他的例行工作。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岳霖从思考中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四周的炸后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木然不知所措。

空袭时,我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们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敌机一离开上空,我和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师,看到遍地炸余,见到金先生和另两位没走避的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没放下的笔。

我们还在昆师、农校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金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人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往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稍有修整,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

生和朱自清、李继侗、陈福田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的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一直住到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在这一长时期中,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旧习惯,除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的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同我们一起“跑警报”。我们也照顾他这一习惯,在这大包厢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一张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他的力作《论道》一书就是在这环境下写出来的。

周培源骑马去上课

周培源和我六十多年的深交,开始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到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任教的1929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貌的暴露,引发了校内敌忾同仇的气氛,同学们纷纷热诚地参加军事训练。不知道是否多少也受这一气氛的影响,在教师中,我们成立一个步枪射击班、一个马术班。我参加了这两个班。培源先生只参加射击班。他说,他在家乡时,已学得土法骑马术,不必再加以西化了。

几月后,这两个班都结束了。但在其基础上,却派生出两个组织:一个是清华骑马会,一个是与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合组的北京猎人会。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我则两会都参加了。猎人会具体的活动是每年春秋二季,会员分别于周末来京郊或去京绥铁路之沙城村打雁;一是冬季远足去山西猎取鹿和野猪,或去绥远猎取野羊,特别是那里特产的大角羊。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但不常出猎。记得只有一年冬天,他和我及清华大学王文显老师、陈福田先生和四至五位协和医院的大夫结伴去山西打猎。到驻地后,每两个人结为一组,由一位向导带路,一早带干粮入山寻找猎物,在天黑前赶回驻地。如此者四至五天。培源先生和我结为一组,我发现他的定向本领特强。在山中转弯来转去,我有时转糊涂了,而他仍

然老马识途地认得归路。虽然每日都有个向导带着我们去寻逐兽迹,但经常是在山中白转了一天,见不到任何猎物。我们一组运气还算好,在这几天内,他打到了一只野猪,我打到了一只鹿。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结伴行猎,但是一个人的性格经常在这种处境中表露出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共同组建“国立临时大学”,后继续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和朱自清因事耽搁好几天,到昆明时,培源先生一家和任之恭先生一家已合赁滇池东侧一私人别墅居住。虽交通不便,但环境十分优美。

但不久情形开始变了。在西南联大成立一学期之后,日机便开始空袭昆明,且空袭日益频繁,联大有眷属的同仁都纷纷搬往昆明郊区居住。一般教师的郊区住处离校本部少则七至八里,多则十几里;城乡间只有小路且无交通设施,只可安步当车。而龙王庙离城太远了,因此,在搬往龙王庙后的头两年,培源先生养了一匹马代步。每逢上课之日,一清早骑马进城上课,下午再骑马回家。但两年之后,昆明物价太贵,他买不起饲马的草料,只好将马卖掉,买一辆自行车,仍然在上课之日风雨无阻地一清早进城,上完课后下午回乡,从不缺课。

在这一时期,培源先生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他的科研工作的。抗战前,他在清华所从事的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到了昆明之后,他改而从事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条件。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工作。我们和他达成一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作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他于是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他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湍流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关于湍流的研究工作为同行所称道并征引。

据《往事偶记》 陈岱孙/著

左宗棠斩驴护树

为了开发大西北以及百姓的长远利益,左宗棠对陕西通往新疆的道路进行了普遍的修整。在大量修路的同时,左宗棠还命人在道路两旁植树。植树的作用,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夏时为行旅提供荫蔽之处。

据说,当时每个士兵所栽之树,都要挂上牌子,保证对树的照料栽培。到了晚上,树上还要悬挂灯笼,提示车马不要碰坏树木。尽管如此,还是有的人素质较差,致使所种之树常遭折损、毁坏。

一天,左宗棠微服出访,发现有的乡民骑驴进城办事,顺手将毛驴拴在树上,而毛驴大啃树皮。他解开缰绳,将驴拉到鼓楼前拴定。然后健步登楼,挥臂击鼓。

顷刻间,衙门大员和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浩浩荡荡、开锣喝道

而来,后面跟着一大群民众。

左宗棠向分巡道和审判官讲明为何要审斩啃树皮的毛驴之后,又说道:“本来,驴主人要一并处斩,但谅其不知规矩和后果,免其一死,下不为例。”衙门卫士又擂三通鼓,分巡道宣布:“杨柳榆槐是左帅及其部属苦心所植,为民造福。然而,常有不法之徒砍伐树木,更有愚众不知珍爱,随意损毁。今左帅亲手逮住一头犯法毛驴,它啃嚼树皮,罪该当斩,立即执行!从今以后,若再有驴马牛羊损毁树木,牲畜与其主人同罪,砍伐树木者罪加一等,勿谓言之不预!”

“开斩!”随着宣判官一声令下,刽子手起刀落,驴头滚落在地,驴身立即倒下。自此,“左宗棠斩驴护树”传为佳话。

据《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陈明福/著

